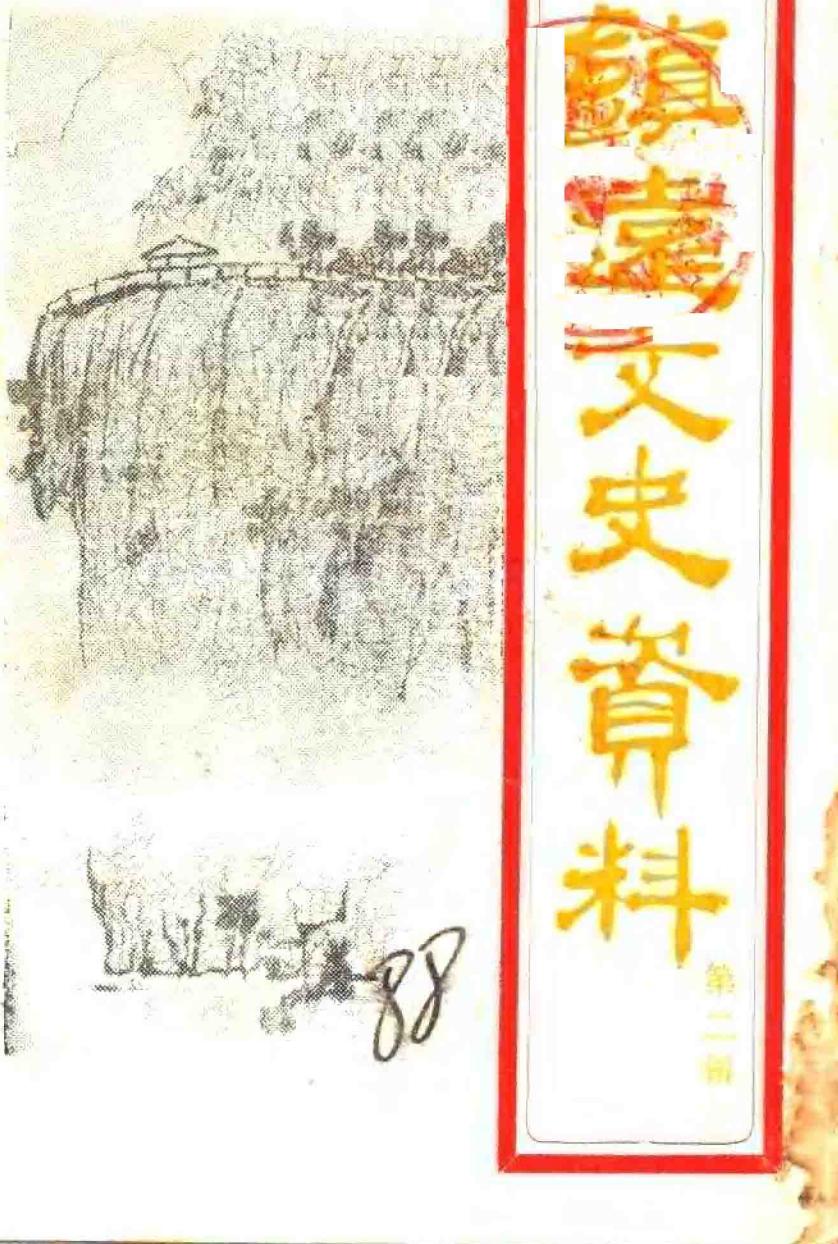


2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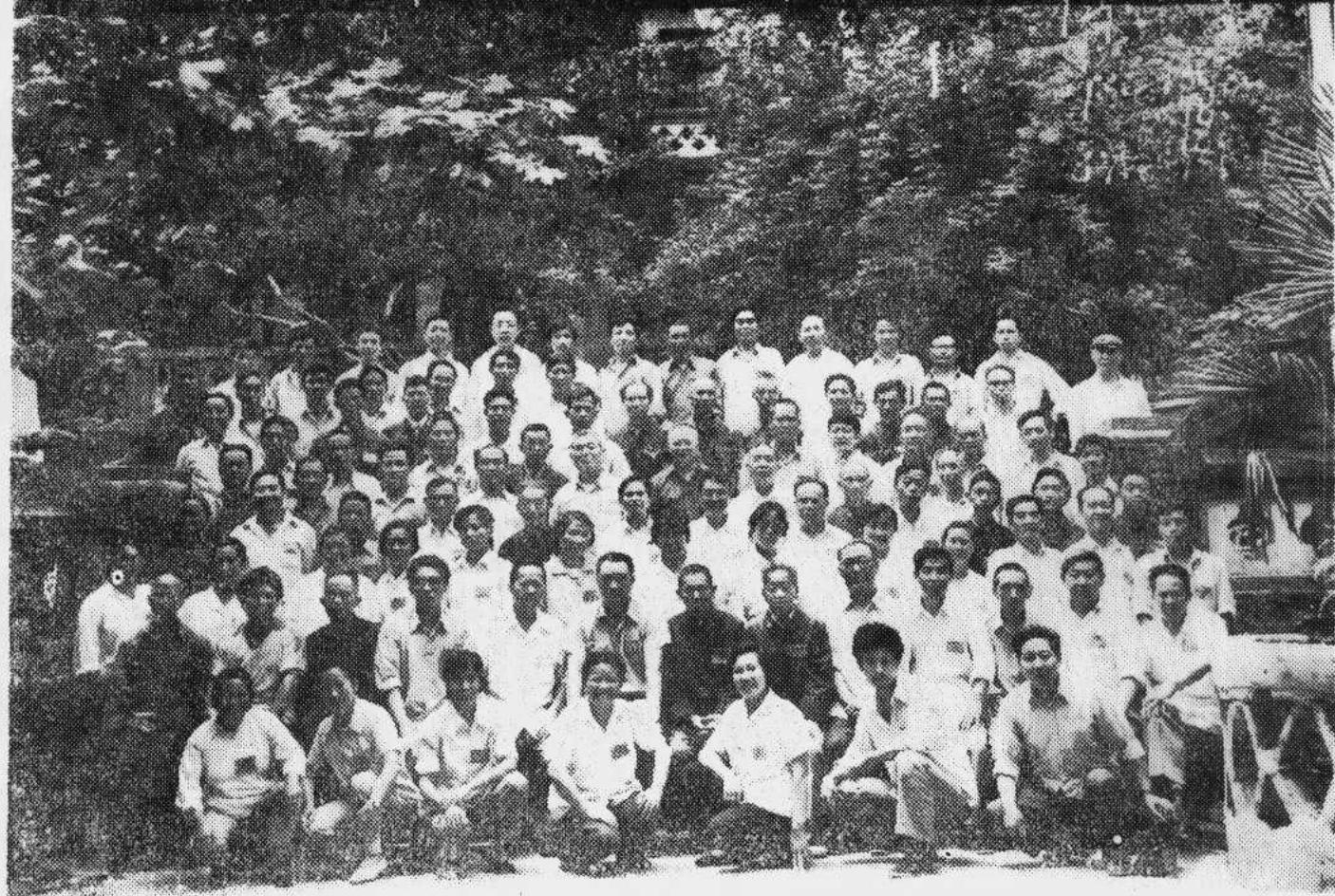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新嘉坡華人社會

县档案馆供稿

政协镇远县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八七年六月



# 目 录

镇远日俘收容所见闻	县政协文史工作组	(1)
黔东事变与日俘所	黔南州政协副主席阮为瑜	(5)
原反战同盟和平村旧址访问记		
.....	作者长谷川敏三 译者汪锐	(7)
附：七律二首并序	雷 岳	(12)
镇远日俘所	蹇人弘整理	(14)
中共镇远支部旧址	蹇人弘整理	(23)
咸同时期苗民起义军在镇远的战事简记		
.....	黄建春整理	(26)
苗侗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在镇远	李泽厚	(33)
一九一九——一九二六镇远人民遭受的灾难		
.....	杨德桑	(36)
镇远县民打百货厘金局（转载）		(42)
冯玉祥将军在镇远尊敬老人	王启明	(45)
秦光远将军传略	黄贵武供稿 杨德桑整理	(46)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蔡玉华	(49)
区委书记曹培山同志的二三事	胡应修	(56)
我所知道的冯世庚老师	黄荣祺	(59)
八大哥潘致和在长吉乡司前之死	吴展明 曾庆奎	(63)
清末时期镇远留日学生	赵德舜、杨德桑	(70)
吴道安事略	杨德桑	(74)
刘堃先生事略	镇远县教育局杨昌明	(77)

吴会贤先生生平记略	毛列爵供稿 历农整理	(82)
清将苏元春事略	杨德燊	(88)
附：苏元春在镇远的遗物	谢 鸣	(94)
风流太守汪炳	胡朝栋原作肖文林缩写	历农整理 (97)
林品南与和耀增	赵德舜	(102)
任盛濂投诚散记	方宗佑	(108)
回忆镇远临时参议会点滴	汪静如	(113)
莲花亭溯源	雷 岳	(116)
镇远紫皇阁的回忆	安永灿	(120)
镇远楹联集锦	黄永锡集	(123)
鬼方小考	雷 岳	(127)
庄跻入滇取道沅水吗？	万承钧	(130)
庄跻入滇是否取道沅水	县志办杨秀金	(132)
循长江乎，溯沅水乎	万承钧	(133)
清末及民国时期的货币在镇远市场的流通	李泽厚	(136)
苗族的婚俗	龙光清	(141)
编后记		(144)
征稿启事		(145)
铁笔钢版画	胡 铸 (封面)	
红军老作家陈靖题字	冯玉照 (封二)	
莲花亭	胡 弘 (封底)	

# 镇远日俘收容所见闻

县政协文史工作组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曾设有两个俘虏收容所，主要关押被俘的侵华日军。来自北战场的战俘，集中关押于陕西安康，此为第一俘虏收容所。来自东战场的战俘，集中关押于湖南常德，后经几度搬迁，于民国二十八年即公元1939年迁来镇远（核审者注：另有两说，一说为一九三七年底，一说为一九三八年迁来），此为第二俘虏收容所，镇远老百姓喊它叫“俘虏营”。

第二俘虏收容所初来镇远。暂住府城二牌（今之兴隆街）女子小学（今之县委），当时校长是杨余三。不久，迁入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此地在镇远卫城十字街右侧。占地面积约为2485平方公尺，四周有高而坚实的三合土板筑围墙。其警卫部队在黔东事变前（1942年初）为军政部特务团第一营第一连，共九十六人，黔东事变后改为第二营五连，共一百二十人，并在南门沟添设岗棚，加强了警卫。

镇远的日俘收容所长叫邹任之，个子矮矮的，是个上校军统特务，曾留学日本，操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俘虏很恨他，因为他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大约两三年就调走了。继任的所长叫莫锦龙，是个高大的老头子，在骑兵中当过上校，其人重钱财，较邹任之开明一些。另有若干名管理人员和政治指导员，都是校级、尉级军官，多数人通日语。

关押的俘虏时有流动，一般为五百余人，多时达七百余。绝大多数是日本人，也有朝鲜人，台湾人，琉球人，还有为数极少的俄国人，这些俄国人身躯高大，碧眼金发，很惹人注目。女俘大概只有三人，据说其中一人曾押我良家妇女到海岛来当军妓。这些战俘有八路军、新四军虏获送来的，也有国民党军队通过湘北大捷和昆仑关大捷虏获的。

当时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发起组织“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厅长就是郭沫若。盟员多为日俘中的下层军士。在邹任之当所长时，盟员很受控制，莫锦龙任所长后，情况有所改变。也有少数顽固分子，具有所谓“武士道”精神，据说这些日俘则关押在收容所附近的昭忠祠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

大多数日俘是遵守监规的，还有不少的战俘具有一定的工艺技术和绘画能力，他们制作各种精巧的竹、木、石、藤等工艺品和小提琴，通过所内的小卖部公开出售。他们喜欢抽烟、喝酒，如果赠以烟酒，也可换回各种手工艺品。收容所曾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夏举办过一次美术工艺作品展览，并请来宾题词留念。记得当时镇远县长沈麟书的题词是“手脑并用”，俘虏们看后，相视而笑，似乎在琢磨题词的含义。

原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来镇远视察，走了好些地方，就是不到收容所去。原因是吴鼎昌有一位日籍夫人，人们便说他的妻弟关押在收容所，怕见了有所不便，不知此说确否。

俘虏收容所于展览工艺品的同时还举办过一次文艺演

出。记得在演出中，首先是一朝鲜籍俘虏用华语引吭歌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继之由一琉球人执剑跳琉球舞，最后一个节目是用日语演出的话剧，主题大意是揭露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祸国殃民政策。其他还演了什么节目就记忆不清了。

俘虏们喜欢打垒球（当时叫棒球），球场就设在“大礼堂”的后面，去俘虏收容所参观的人，往往要看看他们打垒球。

俘虏们一般都讲究卫生，所内没有澡塘，冬天在屋里洗澡，夏天有的经过允许，在所内人员随同下到沈阳河游泳。早晨在菜市场上，经常看到管理伙食人员带一两个俘虏买菜买肉。在山上，也可看到有些俘虏在砍柴，这当然也是特许的，被认为是受所谓“新生活”熏陶有成效的。

俘虏们一般都相当好打麻将，所用的麻将牌都是自己制作的，白天在“大礼堂”楼上几乎都是打麻将的，晚饭后便在“礼堂”中走来走去。可能是借此以消磨岁月，解除其思乡之苦于万一吧！在他们之中打架斗殴的事也是有的，如发生这类事管理员就关他们的禁闭。

在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曾有三个日俘向湖南方向逃跑，他们潜逃方式相当奇怪，三人并不合为一伙，而是彼此保持一段互不见面的距离，走在最前面的一人，边逃边丢树叶，后二人就循着树叶指示的线路逃跑。逃到竹坪，被当地的保长捉住，送往青溪县府关押。所长邹任之在领回俘虏时说，这三个人对柔术都有很深的造诣，如徒手把他们捉住是很不容易的。这三名潜逃未遂的日俘下场如何，不得而知。但据我们记忆所及，在镇远还未听说有处决战俘的事

出现。

日俘如有死亡，所方除剪下死者的一绺头发寄给他的亲人外，一律用京匣子（火板）装殓埋葬。大部分埋在卫城西门外城墙脚下的沙坝上，墙上写有“日人坟地”四字。另有少数埋在西门内的比箭场。埋了以后，便在坟前插上一块小木牌，写上死者的姓名。我们回忆起来，好象有一块木牌写的是霍地三千夫，有一块木牌写的是板垣次太郎，其它的就记不得了。埋在河沙坝的，只因沙土松散，往往刚埋下，夜间就被野狗刨出尸体拖走，再加连年洪水冲刷，泥沙和火板都被冲走。埋在比箭场的，也很难找到半截尸骨。可叹这些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也许至今“犹是春闺梦里人”呢！

民国三十三年（1944）底，日寇侵犯独山，整个贵州吃紧，设在镇远的俘虏收容所也就仓皇转移，二十多辆大卡车，载着全部俘虏和看守官兵，经贵阳而达四川省巴县炉（鹿）角场（一说为重庆南岸——校审者注）。从公元1939年到1944年，这些俘虏在镇远度过了六个年头的生涯，也许可算他们的第二故乡了。

抗战胜利后，收容所原址改为镇远监狱。解放之初中共县委会驻此，后为党校之址。公元1984年将原地址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又被评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曰“和平村旧址”。健在的当年日俘中反战同盟的盟员，十分怀念镇远。他们愿为促进中日邦交而努力，其中一部分曾自公元1982年以后分三批来此旧地重游，观瞻了当年的和平村，受到了我县的热情接待，感触良深，临别犹百感交集，不胜依依而去。

# 黔东事变与日俘所

黔南州政协副主席 阮为瑜

在抗日战争紧张阶段的一九四二年，抗日大后方的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波及达十几个县。当时我任国民党军政部特务第二团第一营长，营部驻黄平东坡，率三个连，其中二连、三连负责自黄平新州至镇远的公路沿线军政部直属第三仓库的十几个军械库的警卫任务。第一连驻镇远城负责警卫军政部直属的日本俘虏收容所。

当黔东事变暴动农民攻进镇远卫城时，在进攻县政府的同时与之相邻的日本俘虏收容所也遭到猛烈围攻。当天拂晓我得到警卫该所的连长黄觉生的电话（营部与该连的专设电话线未被破坏）报告情况说：“拂晓时镇远卫城被暴动农民攻破，县政府及日俘所正被数百名暴动农民分别围攻，现正激战中，请速派队增援。暴动农民声称要抢俘虏……。”我当时除电话命令该连坚决防御，确保该所安全外，并立即抽派驻东坡的机枪连、驻飞云洞的第二连各以两个班组成一个加强排，由一个较能作战的中尉排长率领，立即由东坡急行至镇远增援第一连的作战。当天黄昏前该排即到达镇远，我得到电话报告：“暴动农民武装进攻俘虏所未达到目的，且有部分伤亡，已被迫撤退，日俘所未遭损失，所中人员也未有伤亡……”

事后我亲去镇远该日俘所视察、了解到当暴动农民向日

俘所进攻时日俘们非常恐惧，认为暴动农民若将他们抢走，势必遭到枪杀无疑，今幸得安全无恙，全靠保卫日俘所的官兵防守严密，故对我参加保所战斗的官兵深表敬意。至于当时暴动农民，进攻日俘所的目的是准备抢出日俘图加杀害以报复日本军国主义呢，还是有其他目的呢？我身为一个国民党的职业军官，而且仅仅是一个营长，只能尽我的保卫之职责，其他政治原因则非我所能知者。由于此次保卫日本俘虏收容所的任务完成较好，因而我这个营长曾获军政部传令嘉奖，连长曾晋升少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能维护日俘安全不遭杀害，也可说是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一件好事，一件有益的事。

镇远日本俘虏收容所，何时组成，原驻何地、沿革如何？我一无所知，我知道一九四二年以前，该所是由我团直属机枪连负责警卫，一九四二年初才由我营第一连负责警卫。该所直属军政部军务司管理。有关行政、宣教等均由所长以下的政工人员负责，当时收容的日俘约五百余人，大部是在战场俘获的军人，日俘们的知识面及军事素质，大都较高，因他们很多都来自小手工业者，故所方就允许他们有组织的利用一些竹、木、铝丝等废料作一些小手工艺品，如：麻将牌，小提琴、小高尔夫球等，并在所内设小卖部向外销售，收入归己。从总的来看，所内对日俘的管理、宣教、生活等方面，都比较合理，对待日俘的住、食、衣、医疗等也较我警卫部队的待遇为优，所有日俘与我们的警卫和管理人员感情也较融洽，所内严禁虐待俘虏，而日本的被俘军人一般服从性也较好，因此他们被俘后对于所方的规定还是遵守的。

# 原反战同盟和平村 旧址访问记

作者 長谷川敏三  
译者 汪 锐

我们是原在华参加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的成员。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圆满地访问了四川重庆南岸的和平村旧址后，又决定访问贵州崇山峻岭中的（苗岭山区的镇远县汎阳河畔）原收容所。临行前我们从中日友好协会干部诸先生处打听到，他们已作好了接待我们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得到了可以称之为在抗日战争中是老战友的阳翰笙、林林、冯乃超、康大川等各位先生的支持。其中，康大川先生还热情地、主动要求全程陪同我团前往各地参观。

当年对日俘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以军政部部长为首的特务分子仍然拒绝与共产党合作。这样，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席、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专门为此事与政治部三厅的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等同志进行了联系。决定派人向收容所的日俘组建反战组织。此时，对这种情况大为不满的何应钦等人，向反战同盟会发出了“这种思想极为不妥，还需要再训练”的命令，并强制性地把重庆总部和桂林西南支部的全体成员投入贵州的大山岳内的镇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就这样从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等人开始，以及鹿地亘、池田夫妇等，都象棒打的鸳鸯那样被分离了。郭沫若等人把康大

川先生作为第二俘虏收容所的“高级管理人员”而派到镇远收容所内。这实际上是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而另一边却依然进行着同盟救援工作。但是，这事不久就被发现，康大川被驻守在镇远的宪兵给载上了脚镣手铐，投进了重庆嘉陵江岸的青木关政治犯集中营里。当年我与康大川先生就是在那相识的。

由于贵州省是一个对外没有开放的地区，所以在我们访问镇远前，中日友协会的孙平化等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宣传、说服工作。这样作明显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我们的团名也不仅仅再叫做和平村访华团，而直截了当地作为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访华团对镇远进行访问。当时，正值日本文部省引起的教科书问题，但我们却受到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和镇远县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此外，还热情的邀请了并不是原反战同盟会成员的中古苑生女士（中国研究所所员）也随我团一起前往访问。

因我团由日中友好协会派遣，所以相应地由中日友好协会接待，全团包括中古女士共九人，于1982年8月20日夜到达北京，中日友好协会举办了欢迎宴会，东道主是中华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孙平化副会长，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林林等也在座，席间林林先生代表中方致欢迎词。他在发言中对日本文部省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一事进行了严厉地谴责，他说：对1945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都是亲闻目睹的，是有切身体会的，各位先生可以说是作为发动侵略战争一方的日本士兵代表而来到中国的，你们都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不可否认的铁证。

在中日友协的安排下，决定由康大川先生及翻译吴应健

先生陪伴我团全程旅行。我们结束在北京的探亲访友后，于23日乘机飞往桂林。当年，由于得到在这里发行《救亡日报》的夏衍先生、林林先生等的援助，继重庆总部之后，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于1939年12月25日在郊外的南岗庙成立。次年一月（40年）反战同盟的七名同志在距离入侵昆仑关激战第一线的广岛第五团前面的200米处进行反战广播宣传时，大山、鲇川、松山等三位同志遭到了日军的空袭和炮轰，与中国士兵一起壮烈捐躯。桂林在我们的记忆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康大川先生，小林先生，秋田先生认真地去寻找了当年的遗迹，南岗庙已不存在，为证实遗迹，他们特地在那里停留了几日。

8月25日，我们一行从桂林经黔桂铁路线到达贵阳。首先，受到了副省长秦天真先生和省外事办公室全体人员的热烈欢迎。住宿的饭店是蒋介石曾经住过，解放后周恩来总理、陈毅外交部长等曾下榻过的花溪宾馆。我们还游览了贵阳以西往返300公里处的安顺市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第二天，我们乘坐面包车在苗岭山区的重大山中奔驰了七个半小时，行程270公里，到达了镇远是人民政府招待所，受到了以县长胡化民先生为首的县委、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县政府及苗、侗族人民的代表热情欢迎。

原收容所旧址的大门和围墙还保持原样，原同盟会员宿舍的二层木梯楼房还残存着，现修有一些住所被围在这堵残墙中。最早的一批同盟会员从1941年住进这里，这以后参加同盟会的会员从42年开始，到44年12月1日全部转移到了重庆南岸。康大川管理官也是这时从郭沫若先生处，得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的译文。帮助我们学习，我们每天都在那

昏暗的煤油灯下，用毛笔在粗造的毛边纸上写着，不间断地学习着，认真地改造着“不妥当”的思想。

当康大川先生和团员们再次来到这里时，看到那些在长满了芥菜的、还残存着的建筑物，不禁怀念起那些当年病死在此，葬在后山中的同志们，心中就非常地难过。如果门口没有前来欢迎和看望我们的县民们注视着我们的话，也许我们谁也止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胡化民县长自问自答地说：“你们还记得我吗？还记得在那堵墙外有家豆腐作坊吗？当年我就是那家作豆腐人家的小孩，你们离开这里那年，我才12岁。我经常到收容所的院子里去玩，总看见你们在玩棒球呀，唱歌呀什么的”。胡县长现年52岁，团员们听完胡县长的话后，高兴地与他握手，感到很亲切。

那天晚上，在进入县人民政府为我们举行的欢迎晚会会场——县文化馆的时候，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一幅用中文和日文书写的“欢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访华团”红色大横标高高地悬挂在舞台中央，文艺团体为我们演出了歌舞，乐器演奏，还表演了传统的京剧节目。最后，在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康大川先生站起来对我们一行人说：在今晚这愉快的时刻就要结束的时候，你们大家也得表演表演节目呀！唱首日本民谣什么的都行呀！”真是盛情难却，团员小林唱了一首《长城谣》，中古女士用中文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博得了大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以至她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后，还一直被那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再来一个的叫声包围，直到团长命令她再唱一支日语歌曲《樱花》后，我们才好不容易得到解围。

后来从中古女士与郑女士的谈话中知道，县政府为了迎接我团的来访，于两月前就作好准备接待工作。由于没有宾馆，就决定把县政府招待所有的所有房间都重新粉刷，安排布置成单人房间，寝具、蚊帐、枕套等全换成新的，新修了澡塘，厕所也进行了彻底的扫除。回忆起四十年前，洗澡就在前面的沅阳河里洗凉水澡，厕所则是那近乎于露天的天然厕所。这次，县政府好象全都大力地进行了改造，不用说是要花费相当多的钱，这真使人感到心里不安，激动得难以自己。除此，省人民政府派来随行我团参观的省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王家茂先生和翻译李朝先生，对这次接待准备工作还多方进行了指导。

这个地方的正式名称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属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的自治州，州以下有黄平县、镇远县等县级人民政府。少数民族多居住于多山的地区，所以被称之为“苗岭山区”。当年在煤油灯下曾经写过一本书，详细描述过苗岭山区的情况。解放后，政府在沅阳河的上游拦河筑坝，建造了水电站，现在各处几乎都实现了电气化。昔日的荒山秃岭，现已是层层“梯田”，种植小麦、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居住在苗岭山区的农家，基本上都是苗族和侗族。以前看不见的电线，电杆，现在从这山牵到那岭，植被茂密，都是用飞机播的种。

由于我们一出招待所的大门，就会引来群众的围观，胡县长为了疏通交通，特意调来了交通警察维持秩序。

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别了镇远县城，乘上湘黔线的列车，向长沙进发。然后从长沙奔赴岳阳、武汉、上海。到达上海机场时，延安访问组的香川等三人及TBS的田畠光永等

一起来迎接了我们。后来TBS电视台播出了我们相聚在上海机场的情景，上面田畠先生有这样的结束语，“曾经在两党统治的地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被迫离去的反战志士，四十年后终于又在上海第二次握手。”

(供稿者 雷 岳)

### 附：七律二首并序

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友好访华团，在团长长谷川敏三（株式会社吴山贸易社取缔役会长、日中友好协会本部事务局长、原反战同盟镇远和平村工作队队长）的率领下，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来我县作友好访问。他们一行九人，除中古苑生女士（日本株式会社三冬社取缔役，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会员，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所员，专事研究日中战史）作为该团翻译随同来访外，其余八人均系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镇远和平村工作队队员。他们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被囚禁在镇远原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不期在相隔三十多年之后，还有缘西渡来访，旧地重游。他们来访，受到了我县的热烈欢，和殷情的款待，在我县专事瞻仰了昔日的和平村旧址，参观了我县的名胜古迹青龙洞和民族绣品厂，游览了沅江三峡风景区，缅旧怀新的旧情新景，一时交织在一起，感慨良多。我作为随同导游者，亦感触颇深，临别感赋七律二首以赠，兹特附载于此：